

1949 年 10 月 1 日 15 時，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前隆重舉行開國大典。伴隨著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激昂奮進的旋律，毛澤東親手按動電鈕，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面五星紅旗。接著，毛澤東以他那濃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聲音傳遍天涯海角，震撼神州大地。從此，一個嶄新的時代開始了。

關於新中國國名的討論

為了向全世界鄭重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慶祝這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的誕生，中共中央擬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首都北京隆重舉行開國大典。

中共中央對開國大典的籌備工作十分重視。1949 年 7 月 1 日紀念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十八個生日後，就成立了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周恩來任主任，彭真、林伯渠、聶榮臻、李維漢任副主任。經過充分討論研究，擬定開國大典由三大議程組成：（1）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2）中國人民解放軍閱兵式；（3）人民群眾遊行。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的全過程自始至終充滿了極其民主而和諧的氣氛。從《共同綱領》、政府組成，到國名、國旗、國歌、國徽，無不是經過反覆的討論，按會議程序表決通過的。

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中原本提出的是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直到最後一天的討論，清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張奚若提出質疑。他和幾位老先生都覺得這名字太長，不如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了“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何況，“民主”一詞 democracy 來自希臘文，原義與“人民”相同。於是，經過討論和表決，終於採納了這個提議，確定新中國的國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天安門廣場，開國大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能不能簡稱“中華民國”呢？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因為新政協籌備會第三小組在起草《共同綱領》時，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表述方式。周恩來對此作過解釋，說主要是考慮到“中華民國”已經叫了三十八年，一下子取消，怕有人不能接受。對“中華民國”這一簡稱的使用，大家有不同看法。考慮到這個問題的敏感性，周恩來和林伯渠極為慎重，聯名設午宴邀請三十位辛亥革命時期的前輩徵求意見。這些都是追隨過孫中山先生的老人。反覆交換意見以後，大家終於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中華民國只能代表舊民主主義，二者不能混淆，因此不能用其作簡稱。

這樣，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所有大會文件中，統統去掉了“（簡稱中華民國）”幾個字。

廣場旗杆修建一波三折

在開國大典籌委會確定的三項議程中，無論哪一項，首要的問題都是選定場地。最初選擇場地時，曾考慮到天安門廣場和西苑機場兩處。經過周密對比研究，最後選定了天安門廣場。

天安門廣場原本是皇家專用的一塊禁地，是不許老百姓通過的。開國大典前的天安門廣場，就是中華北門及其東西兩道南北走向的紅牆之間，直到金水橋前凹形的空場，其南北長百餘米，東西寬七八十米，遠沒有現在這麼寬大。

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舉行第一屆市民代表會議，會上作出整修天安門廣場的決議。遵照這個決議，北平市政府責成有關部門制定了天安門廣場整修任務，主要包括以下四項：一是，整修廣場場地供群眾集會用；二是，修補東西長安街道路供遊行的群眾隊伍和閱兵式軍隊通過用；三是，粉刷天安門城樓；四是，在天安門廣場最合適的位置設計並修建與天安門城樓頂一樣高的旗杆，供大典時升國旗用。四項任務中的第四項為重中之重。全部整修工程必須在9月完成。

整修天安門廣場場地，主要是靠北平市各界群眾義務勞動實現的。共青團北平市委籌委會和北平市學聯，要求各校在9月10日星期六下午組織四千三百名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義務勞動。消息在報上和各學校一公佈，兩天時間內，就有一萬八千人報名。各校只好採取抽籤辦法決定誰能參加。9月10日15點，勞動開始。在廣大學生的影響下，北平市各界群眾紛紛來到廣場，參加義務勞動，廣場很快就舊貌換新顏了。

修建旗杆是整修廣場工程四項任務中的重點，完全由專業人員承擔。市建設局相關技術人員主持這項工程。當時提出要求：國旗自動升降，升旗時間要同國歌演奏時間相協調，國歌奏完，旗升到頂，並自動停止。原來，設想旗杆要與天安門城樓頂等高，限於當時的技術條件和時間緊迫，只能根據實際情況作些變更。

技術人員到自來水公司選了四根直徑不同的自來水用鋼管，套起來焊接到一起，只能做到22.5米高，報經上級批准後，按這個修建。施工人員日夜加班，靠搭腳手架，把22.5米高的旗杆樹起來，在底座上固定牢，同時安好了自動升降裝置。在裝上旗杆前，對這套裝置進行了仔細認真的調試，基本做到了正常運行，時間上也符合要求。

為了能在天安門城樓上操縱升旗開關，他們又在修補天安門前東西長安街道路時，預埋了一根橫穿馬路的鋼管，導線通過鋼管橫穿馬路，沿金水橋越過金水河，從城樓東南角引到城樓中央，在那裏接上一個開關按鈕。經過多次試驗，確認自動裝置運行正常了，施工人員才拆除了旗杆四周的腳手架。

9月30日，在正式啟用前，技術人員作最後一次試驗。沒想到的是，旗子升到頂了，馬達還在轉動，結果旗子絞到桿頂的滑輪裏撕破了，卡在裏面退不下來。這時，腳手架已經拆除，無法修理了。

這下，可急壞了大家，馬上向建設局領導報告。很快，調來了組建不久的消防隊。可消防隊架起的雲梯比旗杆頂還低好幾米，根本夠不著。這時，有人急中生智，提議找來兩位善攀高、頗有些名氣的搭彩棚的高手。他們到現場一看，二話沒說，冒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紀念郵票

著危險從雲梯爬過去，再攀到桿頂，把旗子從滑輪裏取了下來。

技術人員又連夜進行多次試驗，直到 10 月 1 日凌晨，終於有把握保證升降裝置正常運行了。但是，他們還是怕“萬一”再有意外。經報請大典指揮部批准，又準備了一套保障措施，即：開會時，讓一個人守在旗杆下，萬一再發生旗子升到頂自動裝置不停的情況，便立即手動切斷電源使升降裝置停下來；另一個人守在天安門城樓安裝開關電鈕的三腳架邊上，以便從技術上保障升旗順利完成。

開國大典隆重舉行

10 月 1 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開國大典，標誌著偉大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新的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為舉世所矚目是理所當然的。

為了這一盛典，各項準備工作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開始了。訓練參加閱兵儀式的各兵種部隊，準備好要放的禮炮、禮花，城樓和廣場的會場佈置，保證第一面五星紅旗的順利升起，以及組織三十萬群眾有條不紊地參加慶祝，所有這些都自上而下層層有專人負責，而且不斷檢查。直到 10 月 1 日天蒙蒙亮時，周恩來還親自登上天安門城樓作最後的檢查，然後又來到廣場審視了整個佈局。

這一天，天安門城樓上懸掛著八盞宮燈，八面巨大的紅旗迎風飄揚，使古老的城樓煥發出媚人的青春。當時還沒有電梯，登上城樓，得一步一步邁上那古老的台階。每一個登上城樓的人，都是那麼意氣風發，心花怒放。

15 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慶祝大會”正式開始。廣場上軍樂隊奏起了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響徹雲霄。毛澤東按動電鈕，升起了第一面國旗——五星紅旗。與此同時，鳴禮炮二十八響。接著，毛澤東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所有這一切，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現場直播傳遍了神州大地。這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進行這樣的現場直播，擔任播音的是當時最優秀的播音員齊越和丁一嵐。如今，重放當年的錄音，還能聽到丁一嵐那清脆悅耳的聲音：“國旗已經上升到旗

杆的頂尖，開始在人民首都的晴空迎風招展。她象徵著中國的歷史已經走入一個新的時代，我們的國旗——五星紅旗將永遠飄揚在人民祖國的大地上。”

接著舉行閱兵式，朱德總司令檢閱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的受閱部隊。10 月 2 日《人民日報》發表《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一文，文中寫道：

密林般飄揚在高空的紅旗，無數紅色的五星燈、圓燈、各種兵器與鐮刀斧頭，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央人民政府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巨幅標語下標誌出人們一致的強烈願望：要鞏固自己的祖國與人民政府。所以，在朱總司令檢閱人民的海陸空軍部隊與這些部隊在會場中心舉行分列時，群眾中湧起了同樣狂熱的歡呼。整整兩個半鐘頭的檢閱，許多人連坐也沒坐一下。電影機、照相機、望遠鏡和幾十萬雙眼睛，一直集中凝結在受檢閱的部隊身上，生怕看不清或漏過任何一個可以看得到的武器與戰士。

人民的武裝部隊兩個半小時的檢閱，給予人民的是更加堅固的勝利信心。我國年輕的海軍部隊與空軍部隊，第一次公開地列隊出現在人民領袖和廣大人民的面前了。海軍陸戰隊整齊的步伐、煥發的精神，使人堅信他們既然從無變成有，必將從小變成大。隨著我們偉大祖國的繁榮鼎盛，我們會建設起一支強大的海軍。空軍成列成隊地飛過會場的上空，人叢中帽子飛舞起來，手巾揮舞起來，手裏拿著報紙和其他物件都飛舞起來。人們隨著軍樂隊奏出的《解放軍進行曲》的響亮節奏拍著手，合著拍子，發出這樣那樣的聲音，幾十萬的脈搏同速地跳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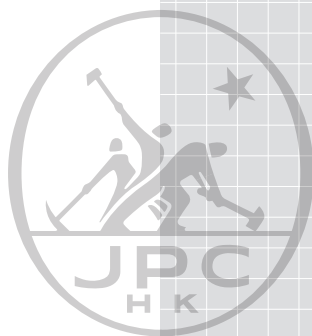
步兵部隊、炮兵部隊、戰車部隊與騎兵部隊以等距離、等速度整連整團整師地穩步行進，是檢閱中歷時最長的一段，一直頂到太陽西下。但是，人們不厭其多，不厭其久；人們互相詢問著：“這是什麼炮呀？”“這是什麼人呀！”每個人都把別人當成全知者，想更多地得到對自己部隊的知識。指揮台上久經戰陣的軍官們向身旁的非部隊人員不斷地解答著：“頭兩輛並排的小吉普車是指揮員和政委，後兩輛是參謀長和政治主任，後面一輛是旗兵，這隊野炮是日式九零野炮，能打三十華里，這是美國的十五生的大榴彈炮，這是中型坦克，這是裝甲車營……”所有摩托車與戰車、炮車……都是油漆了的，裝了紅星與八一字樣，輪子一圈白，顏色壯美而一致。這是人民的戰士們加意裝飾了的。

往西長安街看，不知部隊已走出多少里；往東長安街看，不知還有多少里長



的部隊準備走進會場來，人們越看越振奮，覺得自己祖國的武裝力量已是如此地強大。騎兵部隊的許多連隊最後以極整齊的五馬並跑經過主席台前時，激起多次的熱烈鼓掌。不僅跑的齊，而且馬的顏色也是以各個連隊為單位，要白全白，要紅全紅。最後一隊騎兵跑過去的時候，天安門紫壁上的太陽燈、各色燈光在黃昏裏開始發亮，人叢裏的燈籠火把都點著了火，全場一片火光紅浪；爆花筒向高空成群成群地放出紅色、綠色、雪白色火球，拉著無數美豔的火絲，回頭下降，劈劈啪啪響成一片。東西長安街上夾道的人群，開始圍觀提燈遊行的漫長行列，交互地喊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央人民政府萬歲”、“毛主席萬歲”的歡聲。

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毛澤東不顧新政府面臨的千頭萬緒，又急切地提出了訪蘇的要求。

斯大林：“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

毛澤東：“搞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應該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澤東說要提前回國。

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初次會晤斯大林

1949年6月30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週年的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出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旗幟鮮明地向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堅定不移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宿願得償

毛澤東非常重視同蘇聯的關係，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桅杆剛剛冒出地平線時，他就多次提出過訪問蘇聯的要求。但由於種種原因，始終沒有成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剛一宣告成立，毛澤東不顧新政府面臨的千頭萬緒，又急切地提出了訪蘇的要求。

1949年11月5日，毛澤東要求斯大林的聯絡員柯瓦廖夫向斯大林轉達他想去莫斯科的願望。他說，他希望12月就去莫斯科拜訪斯大林，因為那時恰逢斯大林七十歲大壽，蘇聯友好國家的代表團將從世界各地前往莫斯科，這樣，“訪問莫斯科將更具有公開的性質”。

為正式表達他的願望，三天後，毛澤東向莫斯科發出正式電報，表示希望訪問蘇聯。毛澤東仍不放心，考慮到以往的幾次訪蘇要求都被斯大林以各種藉口婉拒，他這一次下定決心要達到目的。因此，毛澤東又通過多種方式向斯大林表明他的強烈意願。

9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專門致電新任駐蘇大使王稼祥，說明已請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請他立即詢問蘇聯方面，斯大林準備何時邀請毛澤東去莫斯科。10日，毛澤東又委託周恩來去會見蘇聯大使羅申，再請羅申將毛澤東的願望轉達給莫斯科。

經過這一連串的催促之後，蘇聯方面終於作出了正式答覆，同意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最高領導人的身份，於斯大林七十歲誕辰慶祝活動舉行之之前，前往莫斯科開始他的正式訪問。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時整，毛澤東乘坐的專列徐徐開進莫斯科的雅羅斯拉夫車站。

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蘇軍元帥布爾加寧等人在車站迎接毛澤東。他們知道毛澤東在路上感冒，身體不適，解釋說，本來在車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因天冷，一切從簡，只有一個儀仗隊舉行迎接禮，只須繞行一趟，也無須答禮。如願發表談話，可把發言稿交報社發表。總之，所有檔案材料都表明，毛澤東並未受到他所期望的那種熱烈的擁抱和歡迎。

歡迎儀式結束後，毛澤東前往斯大林的第二別墅下榻。這是斯大林在衛國戰爭期間的住所，有一個很大的地下指揮部。

當天18時，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的小會客廳會見毛澤東。18時整，廳門打開了。斯大林和蘇共全體政治局委員及維辛斯基外長站成一排，迎接毛澤東。這是破例的一次，斯大林一般不到門口迎接外賓。斯大林緊緊地握著毛澤東的手，端詳了一陣說：“你很年輕，紅光滿面，容光煥發，很了不起！”他回過頭來，又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紹給毛澤東。大家圍站在大廳裏，相互問好，互表祝願。

斯大林對毛澤東讚不絕口：“偉大，真偉大！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我們祝願你健康！”又說：“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祝賀你們前進！”

這時氣氛十分熱烈、動人。毛澤東回答說：“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不等毛澤東講完，斯大林立即插話：“勝利者是不審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

大家邊談邊徐徐入座。蘇方官員列坐在斯大林的右側，毛澤東及翻譯師哲坐在左側。雙方的談話海闊天空，從前線的軍事情況談到經濟建設、糧食收成、土地改革以及群眾工作等。談話從一開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澤東此行的意圖和願望。談話歷時兩個多小時，蘇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說話，其他人都未插話。

斯大林問毛澤東：“你來一趟是不容易的，那麼我們這次應該做些什麼？你有些什麼想法或願望？”毛澤東表示：這次來，一是為祝賀斯大林七十壽辰；二是看一看蘇聯，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都想看一看。斯大林說：“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

咱們要不要搞個什麼東西？”毛澤東回答：“恐怕是要經過雙方協商搞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應該是既好看，又好吃。”這句現在經常引用的話當時頗令蘇聯人困惑不解，中方翻譯師哲試圖但並沒完全翻譯清楚這句話。

毛澤東這裏所談到的“這個東西”，其實指的就是兩國之間應該簽訂一個新的條約。這件事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劉少奇秘密訪蘇期間已經作為一個重要問題與斯大林初步商談過了。毛澤東急於到蘇聯的目的，也正是為了“這個東西”。畢竟一個新中國的建立需要有一個完全不同於舊中國的新面貌，而以一種顯示共產黨國家之間平等關係的新條約來代替國民政府同蘇聯訂立的舊條約，也是向國人和世界證明毛澤東選擇“一邊倒”的必要性的最有力的證據。而斯大林沒有理解東方人的幽默，還是猜不透毛澤東此次訪問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仍婉轉地繼續詢問。毛澤東不肯明說，可能是他認為蘇方應該主動提出幫助我們，不主動提是不誠懇的。他對斯大林說：“我想叫周恩來總理來一趟。”斯大林表示驚訝，反問道：“如果我們不能確定要完成什麼事情，為什麼還叫他來，他來幹什麼？”顯然，斯大林在追根尋底，但毛澤東沒有回答。

總之，在第一次會見中，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沒有猜透對方的心理和意圖。這是雙方首次會談遇到的難題。

莫斯科冬日的寒意

第一次會談之後，毛澤東感到有點奇怪，他不曾再見到斯大林或其他政治局成員再來進行任何實質性討論，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1950 年 1 月。在這段時間，毛澤東可能僅在一個更大的場合與斯大林見了面，那是 12 月 21 日，這一天中國代表團和其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代表團一起參加了斯大林七十大壽的慶典。

從此時到年交之際的那段時間，斯大林給毛澤東打了兩三次電話，但電話的內容非常普通，並沒有打算打破當時的停滯。這些電話的調子與斯大林和毛澤東初次見面的調子基本一致，暗示在 12 月斯大林仍不願推動正式條約的談判。

毛澤東曾在 1956 年與蘇聯大使尤金會談時對此進行了回憶：

在和斯大林的第一次非常會見中，我建議最後搞個國與國之間的條約，但是斯大林沒有回答。在我們第二次會見中，我又重談這個問題，給斯大林看了中共中央建議簽訂同樣條約的電報。我建議周恩來可以來莫斯科，因為他是外交部長。但是，斯大林反對這項建議，說這很不便利。因為資產階級的報刊會大叫整個中國政府都在莫斯科。接下來，斯大林避免與我見面。我試圖給他的公寓打電話，但他們總是回答斯大林不在，並提議我與米高揚見面。

就在 12 月 21 日壽辰慶典之前，毛澤東對蘇方的這種慢節奏開始表示憤怒了，並開始把他想與斯大林進行實質性討論的想法公之於眾。毛澤東在住處接待了柯瓦廖夫和使館參贊、中文翻譯費德林，並請柯瓦廖夫安排在 12 月 23 日或 24 日與斯大林見面，同時提供了兩種可供選擇的行動方案：要麼正式解決一攬子問題，其中中蘇條約是關鍵；要麼發表共同聲明，以體現雙方的某種理解。

以後，毛澤東曾回憶起 12 月在莫斯科的事情。他說，在他滯留莫斯科期間，他感覺到了不快，結果他下定決心待在別墅裏一動也不動。和柯瓦廖夫、費德林的談話氣氛是不佳的，他有意這麼做，因為他想通過這兩個人把他不滿的信息傳給斯大林。此時，這兩個人其實是擔任了翻譯、陪客和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的“信使”。有一次和柯瓦廖夫交談時，毛澤東怒氣沖沖，要求知道請他來莫斯科的原因。“你們把我叫到莫斯科來，什麼事也不辦，我是幹什麼來的？難道我來這裏就是為天天吃飯、拉屎、睡覺嗎？”

後來湊巧發生了一件沒有預料到的事：英國通訊社造謠說，斯大林把毛澤東軟禁起來了。毛澤東訪問蘇聯，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同蘇聯黨和政府最高領導人的第一次直接會晤，理所當然會引起國際輿論的高度重視。但十幾天來，竟沒有消息報道會晤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這當然要引起種種猜測。中國代表團為此很著急。此時，足智多謀的王稼祥提出以毛澤東主席答塔斯社記者問的形式，在報上公佈毛澤東到蘇聯的目的。1950 年 1 月 2 日，這個《答記者問》見報。

在《答記者問》中，毛澤東說：“我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部分地決定於解決有關

